

由谣到诗

——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罗世琴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

摘要: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关键词:谣音;歌谣;歌;诗歌;歌诗;诗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5)03-0035-03

关于诗歌起源问题,古今学人异见纷陈,莫衷一是。其关键在于对“诗”之涵义理解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诗歌起源可远溯于歌谣之前。总体而言,有文字记载前,当经历了由原始“谣音”到原始“歌谣”,再至“歌”的演变历程,而诗歌的抒情因素与叙事因素也可远溯于文字记载之前;有文字记载之后,以“诗”乐合一为主流,《诗经》便成了最有代表性的“诗”乐结合体。至于“歌诗”,只是某一阶段内对乐府诗之特定称呼。建安时代“诗”与乐又有分离,真正由文人创作的徒诗出现,推动中国诗歌步入新的发展进程。

一、“诗”的涵义

诗歌起源是文学界争执最多的问题之一。古人对诗之起源解释不尽相同,关键在于对“诗”之涵义的理解存有分歧。《尚书·虞书》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汉郑玄《诗谱序》指出:“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汉人研究经史,注重严格考证,郑玄正是从上古“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来判断,认定诗之起源约在虞时,因为“诗”最早见于《虞书》。朱光潜先生认为“这种推理显然很牵强”^[1]。先不必说古文《尚书》至今真伪难辨,仅就古佚整理这一角度而言,也不可因没有见到历史而去否定历史的存在。然而郑玄既以“有亡载籍”断言“诗之道”“放”于虞时,可见他所认为的“诗”是以文字形式记载之诗。

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亦论诗之起源:“昔葛天氏乐词云:玄鸟在曲,皇帝云门,理不穷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由观“舜造南风之诗”而断定诗之起源。朱光潜先生又认为,这只是“搜罗古佚”而已,因为其中含有两个根本错误的观念:①它假定在历史记载上最古的诗就是

诗的起源;②它假定在最古的诗之外寻不出诗的起源。^[2]

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刘勰明确指出“葛天氏乐词”、“大唐之歌”、“南风之诗”,可见他虽也是以有文字记载的“诗”作为诗之原貌,但至少已将“乐词”、“歌”、“诗”等名词严格区分,这无疑与“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谣、讴、歌、曲、词、调”^[3]之说暗合。

而沈约的观点,又代表着对诗起源的另一种理解。《宋书·谢灵运传》载:“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现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抛开一切考据佚文,独从“歌咏所兴”推出诗之起源,认为诗之起源“宜自生民始也”,也即与人类起源同步。可见他所认为的“诗”并非一定要用文字记载,“现无或异”皆可算作“诗”。这与郑玄、刘勰所认为的诗之起源显有不同。

唐孔颖达又有它见,其《毛诗正义》曰:“舜承于尧,明尧已用诗矣”。古《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于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这的确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的折中看法:从“讴歌之初”与“造今诗之初”两个阶段定义诗,前者与人类产生同步,后者虽见于舜世,但其起源也必定早于舜世。至此,古人在认识上将“讴歌”与“今诗”区别开来,或可说古人开始意识到“讴歌”与“今诗”是诗歌发生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综观以上有关诗之起源的论述,究其异见纷陈之原由,关键在对有关“诗”的涵义及其表现特征理解的不同,因此我们更有必要知“诗”而论。

二、文字记载之前的诗歌雏形

原始人在尚无完善的语言表达能力时,往往采用“啊”、

收稿日期:2004-11-12

作者简介:罗世琴(1976—),女,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E-mail:happyluoshiqin@sina.com

“哎”、“嗷”、“呜”等音,虽然这些声音在当时并不具备完善的声调与声韵,只是在手动动作的同时辅以简单的情绪化符号,但它们确为必不可少的辅助方式。如此的声音,称之为“歌谣”或“歌”似乎欠妥,因为这只是人类发音器官的自发行为,通过辅助身体动作以达到更为准确的表达,就其声音特征而言与动物鸣叫几乎无异,甚至语言学界往往将其忽略,直接称此阶段的表达方式“为”“手势语”,却不称之为“语言”。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很清楚。他说:‘……所谓手势语言底意义——由于它极端贫乏和有限——是小得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不是能这样或那样地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讲话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与现代最新式的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可见,手势语根本就不成其为语言,更谈不到是第一性的语言了。’”^[4]

对这些只能起辅助作用的声音,只是虚词而无实意,我们且称之为原始“谣音”。

随着人类情绪表达的多样化以及劳动生产、图腾崇拜仪式中协作的需要,由原始“谣音”不断向前发展,出现了实词,由只表感叹的虚词到表意义的实词,就使声音的表达逐步趋于丰富和具有实际意义,产生了语言。闻一多先生认为:“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实字是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前者是冲动的,后者是理智的。由冲动的发泄情绪,到理智的形容,分析,解释情绪,歌者是由主观进入了客观的地位。……在感叹字上加实字,歌者等于替自己当翻译,译词当然不能在原辞之前,感叹字本只有声而无字,所以是音乐的,实字则是已成形的语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感叹字是伯牙的琴声,实字乃钟子期讲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自然伯牙不鼓琴;钟子期也就没有这两句话了。感叹字必须发生在实字之前,如此的明显,后人乃称歌中最主要的感叹字‘兮’为语助,语尾,真是车子放在马前面了。”^[5]

闻一多先生还指出无论实词的表达,还是虚词的表达,皆统称“歌”,并认为歌都是抒情的。与其所述略有不同的是:我们把没有实词的“谣音”与有了实词相衬的“歌谣”区别开来了。此外,“歌谣”与原始“谣音”相比,又加入了节奏变化,虽然该变化仍尚未与音乐结合,仅依表达时长短句的应用来完成。

《释乐》:“徒歌曰谣。”《诗·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曲合曰歌,徒歌曰谣。”《大雅·传》:“歌者比于琴瑟而已,徒歌曰谣。”《说文》:“谣,徒歌,从言肉声。”皆指出谣(无论是原始谣音还是歌谣)尚未与音乐结合。

“歌谣”虽也未经过特殊的语言与音乐加工,但与原始“谣音”相比,不再是发音器官依赖于动作而发出的声音,而已为相对独立的表意符号。前者是个体性的,后者是集体性与个体性之融和。至此,不难推出原始的“谣音”是抒情的,原始的“歌谣”则不但蕴涵着一定抒情因素,而且蕴涵有一定叙事因素。现在一些土著部落仍通过歌谣教会下一代耕作、渔猎,正是应用了歌谣中的实词及其叙事因素,这些“歌谣”被文字记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其传播环境中没有文字的存在,或说其

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根本就未曾掌握文字工具。

从“歌谣”开始就对语言节奏有所要求,由于尚无文字记载,其流传只能靠记忆进行。因此按顿挫的节奏编制所要传播的信息内容,更易于适应听觉,便于记忆,同时配合单一反复的原始劳作动作。

三、最早被文字记载的诗歌形式

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6],夏商时管乐器开始出现,这无疑推动了原始“歌谣”向歌发展。至于何谓“歌”,前人已论述: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晋石崇《思归引》序)

乐器之出现促成歌之出现,使语言表达与音乐表现紧密结合,以延展人们表现情绪、传播信息的方式,加之上文所谈“歌谣”中既已存在具体劳动动作,于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雏形便形成了。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使陈夫人鼓瑟,上自依弦而歌”,此处“依弦而歌”显然与“鼓瑟”相统一,乐器为歌而奏。又如唐韩愈《湘中》诗:“萍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夫叩舷歌。”渔夫为何要“叩舷”而“歌”?原因就在于在这时候,诗与音乐即已不可分隔,当时情形下,渔夫苦于无乐可以相和,无奈之中,唯有叩舷以代之。

“歌”与“歌谣”迥异之处主要在于“歌”与音乐相融,“歌谣”只是加入了实词及简单节奏的语言,并不凭借乐器来延伸其表达方式。《史记·商君列传》写商鞅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杵”。其中童子所为称“歌谣”,正因为在当时,歌谣无需专门乐器伴奏,而后来的歌则必需专门乐器以相和。管乐是继鼓之后出现最早的中国乐器,如笙、箫等,其与鼓不同之处就在于鼓只表明简单节奏,管乐则以更完善的音乐姿态出现。

夏商时,文字更进一步飞跃发展,章太炎先生《〈易〉论》之《[附]造字缘起说》对文字起源做如下解释。《荀子·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一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一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一也。”依此,是仓颉以前,已先有造书者,亦犹后稷以前,神农已务稼穡;后夔以前,伶伦已作律吕也。夫人类四肢,官骸常动,持荇画地,便已纵横成象,用为符号,百姓与能,自不待仓颉也。^[7]

可见,虽然章太炎先生所认为的文字起源可追溯于仓颉之前,但他也承认就文字表意特征之统一而言,始自夏。由“百姓与能”的个体解读符号至能达到交流目的的群体解读符号,的确是文字历史上一大飞跃。一旦文字有了群体交流功能,以其记载“歌谣”与“歌”便是自然之事,于是有了闻一多先生所言的“诗”之阶段。^[8]

鲁迅先生亦认为:有史以前人们虽唱歌,但“文字毫无用处”;原始社会里“史”的开头源于巫想法子记事;有专门记事的史官后,“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9]

原始“歌谣”以文字记载,一般皆为简短鲜明的“鼓的节

奏”^[10]。如：《吴越春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记“歌”之诗则复杂得多，《诗经》便是其最主要的代表。由此引出对以下所述之“诗”的理解：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于文，谓之音。（《诗·大序》）

朱熹《诗序》引用此段文字，并进一步论述：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又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此处所言之“诗”，是为《诗三百》之序及对其序解释时所言，未必就是许多学者引用时谈及的普遍意义之诗，与《庄子》中所论之“诗”似乎更为接近，《庄子·天下篇》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诗经》就是将“言”、“嗟叹”、“歌”、“舞”等外在感知记载成“诗”，以使之获得更广泛的传播。“诗之为言志也”（《诗谱序》疏引《春秋说题辞》）、“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中的“诗”，特指《诗经》中所载之诗，也似乎更为妥贴。

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中训“志”，认为：“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

“诗”以言“志”为特点，将当时流行的歌谣与歌以文字形式记载，这既以文字产生为前提，也是音乐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旦以文字记载，便有了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如字数的齐整程度等，加之表达的复杂化，于是有了四言诗的出现。

称之为“诗歌”，是因为这些记载的四言诗都借音乐以抒情言史，《诗》三百篇，篇篇皆可入乐，可歌唱，所以《诗经》代表着“诗”与“歌”结合的最高峰，“成为最可靠的古诗集本了，也就是中国诗的来源了。”^[11]

《诗经》所载诗歌多为对民歌采集之后又经加工整理而成，汉代人设立乐府机构收集民歌，进行加工整理，但他们都还未直接称所收集的为“乐府”。《汉书·礼乐志》：“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越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和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颜师古注该段文字，指出：“乐府之名，盖始于此。哀帝时罢之。”《汉书·艺文志》又曰：“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

可见，当时乐府只是采集歌谣与歌并诵之的朝廷音乐机构，并不代表文学作品的某种样式，汉人称乐府机构采集的这些歌谣与歌为“歌诗”。从魏晋开始人们才将乐府采集并演唱的诗篇以及后世文人模仿之作统称“乐府”，以与徒诗相别。因

此，梁萧统编《文选》，另立乐府，与赋、骚、诗并列。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篇外，另立《乐府》与之相并。

则“诗歌”与“歌诗”的区别又在何处？

正如上文所言，“诗歌”是诗与歌的融合，二者缺一不可，究其结构当是并列关系。“歌诗”则未必也如此，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汉世所谓歌诗者，有声音曲折，可以弦歌，如《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七折》七十五篇是也。故《三侯》、《天马》诸篇，太史公悉称诗。盖《乐府》外无称歌诗者。”

朱自清先生《中国歌谣》也对“歌诗”加以讨论：“这些歌诗绝不是徒歌，一因其中有‘曲折’（即乐谱），二因它们都在《乐府》。”

可见，“歌诗”中两词关系已有一定变化，“诗”是主要中心词，“歌”仅起修饰作用，究其结构当是偏正关系。若再深究一步，不难发现“歌诗”一词近乎专有名词，特指汉时配有乐谱并可歌唱的乐府诗，这暗示着“歌”在诗歌中地位的衰退。

至晋以后，“诗歌”与“歌诗”大量相互交替使用。如晋崔豹《古音注·音乐》：“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前蜀韦庄《乞彩笔歌》：“我有歌诗一千首，”宋范仲淹《即席呈太傅相公》：“白傅歌诗传海外，晋公桃李满人间。”清莫友芝《巢经巢集歌》序：“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

“歌诗”与“诗歌”可相交错称呼，很大程度有赖于乐府体变化过程中诗与音乐的分离，自曹操始，就“借古乐府写时事”^[12]，他的《薤露行》、《蒿里行》，原本都是出殡时挽柩人所唱的挽歌，曹操却用以写当时的现状，这影响到当时大批诗人亦“用古乐府自作诗”。至曹植，可入乐的诗就很少了，除《置酒》《明》等少数几篇外，《名都篇》、《白马篇》、《美女篇》等大多数已不采用旧乐府曲调，完全成为徒诗了。“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系指曹植对“诗”从音乐中独立所做之贡献。

既然已为徒诗，歌乐不再起主要制约作用，因此称之为“诗歌”或“歌诗”在涵义上已基本不存在太大区别，皆可指“诗”。

四、结 语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我们将没有文字记载的诗歌以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作为主线，有文字记载之后又以“诗歌”、“歌诗”、“诗”来称，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一条线般的发展，而是有并存、有相融的网状关系，文学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其中的变化自然也多样而复杂，至今我们仍不难从一些部落中找到原始歌谣的痕迹，就是明证。

（下转第 44 页）

参考文献:

- [1] 周元.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论及阶段转换能力评估研究[D].2003.5:21-29.
- [2] 北京理工大学与云南省省校合作项目课题组.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现状研究[R]. 2004.6.
- [3] 吕薇. 杭州开发区的管理体制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02(2):26-33.
- [4] 刘卫东. 上海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 2001(3):159-164.
- [5] Effie Kesidou.knowledge spillovers in high-tech clu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Globelics Academy, 2004(3):59-67.
- [6] 刘志, 汪婷. 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问题研究的综述[J]. 中国科技论坛, 2003.3:59-62.
- [7] 郭俊华, 杨新年. 我国开发区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对策[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2(1):6-9.

A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High Technology Zones

HAN Bo-tang, FANG Wei, ZHU Mei-guang, LI Q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essay offers a comparison in the integration models of administrative zone and high technology zon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management models of high technology zone. It attempts to proof the reasonability, feas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integration management models, and indicates the possible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o solving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zone; high technology zone; integration; management model.

(上接第 37 页)

参考文献:

- [1][2][11] 朱光潜.诗论·诗的起源[M]. 合肥:安徽文艺教育出版社,1997,2.
- [3] [唐]元稹. 乐府古题序.
- [4] 高名凯,石安石. 语言学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7,13. 原注曰:“斯大林:《给同志们的回答》,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页。”
- [5] 闻一多. 神话与诗·诗歌篇·歌与诗[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8-199.
- [6] 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 [7] 章太炎.《易》论·[附]造字缘起说.刘凌,孔繁荣. 章太炎学术论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5-36.
- [8] 闻一多. 神话与诗·诗歌篇·歌与诗[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3.其二曰:“无文字时专凭记忆,文字产生以后,则用文字记载以代记忆,故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第202页)又曰:“一切记载既皆谓之志,而韵文产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
- [9] 鲁迅.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M]. 同文之. 字是怎么来的? 又指出:“夏禹的‘峒嶙碑’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种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原始形态。”
- [10] 叶君远. 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4.
- [12] [清]沈德潜. 古诗源(卷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63,106.

From Ballad to Written Poetry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etry and its Initial Development

LUO Shi-qin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Before written record came into existence,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e., ballad, original ballad and poem, and in the process of evolvement certain element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narration are added. After written record came into existence, it witnessed a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formats of poem, poem ballad and poetry. From the initial ballad to a mature poetry,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confluence and transition.

Keywords: ballad; poem ballad; song; poem; poetry.